

“人”形构件字语义扩展中的隐喻转喻

阮文公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2026年7月17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6日

摘要

人形构件是现代汉字构形表意体系中最基础、使用频次较高的构件，汉字合体字的语义扩展大多依托构件之间的语义组合。本文以认知语言学隐喻与转喻理论为基础，以通用规范现代汉字为研究范围，聚焦“人”形构件在构意过程中的语义扩展路径，剖析其与其他构件组合表意时隐喻、转喻两种认知机制，厘清语义扩展过程中的隐喻与转喻类型。研究表明，人形构件语义扩展以人体认知原型为根基，转喻依靠认知邻近性实现域内语义指代，隐喻依靠认知相似性完成跨域语义映射；二者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汉字本义向引申义、抽象义逐层演化。立足构件认知规律，可为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提供全新教学思路。

关键词

人形构件，语义组合，隐喻，转喻，认知机制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uman-Shaped” Component Characters

Wengong R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July 17,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2,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6, 2026

Abstract

Human-shaped components are among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frequently used components in the ideographic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compound Chinese characters largely relies on the semantic combinations between their component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study takes the standardized modern Chinese characters listed in the *Table of General Standard Chinese Characters* as its research scope and

文章引用：阮文公. “人”形构件字语义扩展中的隐喻转喻[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435-443.

DOI: 10.12677/ml.2026.149942

focuses on the semantic extension paths of human-shaped components in character formation. It analyzes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nvolved in the semantic construction of human-shaped components when combined with other components, and clarifies the types of metaphorical and metonymic extensions in the process of semant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uman-shaped components is rooted in the human cognitive prototype. Metonymy realizes intra-domain semantic reference through cognitive contiguity, while metaphor accomplishes cross-domain semantic mapping through cognitive similarity. The two mechanisms interact and jointly promote the gradual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meanings from original meanings to extended and abstract meanings. By exploring the cognitive principles of character components, this study provides new approaches for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Human-Shaped Components, Semantic Combination, Metaphor, Metonymy, Cognitive Mechanism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字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自源性表意文字体系，其形体与意义之间的深度关联构成了汉字研究的核心命题。王宁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汉字构形一定要与语言有一定的联系”“每一个具体的汉字，是根据它所记录的汉语中某一个语素的意义来构形的”[1]。这一论断揭示了汉字构形的本质特征，汉字的形体并非任意符号，而是以物象为蓝本、以语义为核心的有理据的编码系统，这正是汉字认知研究的逻辑起点。汉字构造与语义引申中的隐喻、转喻认知机制，是文字学与认知语言学交叉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学界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现代人形构件字的语义扩展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期研究聚焦汉字同源关系与造字思维的隐喻属性。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中率先指出，同源字的语义关联可通过比喻机制形成，证实比喻是汉字语义同源、语义衍生的重要动因，为汉字隐喻认知研究提供了核心理论依据[2]。许进(1990)突破传统造字法分类，提出“比喻造字法”概念，明确会意字、形声字的构件与整字之间可依托相似性建立语义关联，以构件为喻体承载整字本义，直接佐证了汉字构件造字阶段即存在隐喻思维[3]。

21 世纪以来，学界从认知视角深入挖掘汉字系统的隐转喻机制，研究维度不断细化。部分研究聚焦专书与特定构件，李秀明(2006)专门探析《说文解字》“心部”类汉字造字过程中的隐喻逻辑，实现了构件层面的微观研究突破[4]；滕华英(2008)以《同源字典》同源字为核心语料，系统阐释了汉语同源词及汉字语义演化的隐喻认知机制[5]；钟力明(2010)进一步印证汉字构形体系根植于隐喻认知[6]。

与此同时，学界逐步区分隐喻与转喻的差异化作用，形成多元观点。陈枫(2006)明确界定汉字字符与整字的语义关系，提出构件与字义的关联以转喻为主、隐喻为辅，厘清了两种认知机制的主次差异[7]。周运会(2010)则从汉字起源、《说文解字》构件体系两个维度，探究概念隐喻的运作规律，完善了汉字隐转喻的历时研究框架[8]。

成宇(2024)在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理论的现代汉字构件语义组配研究中，完善了现代汉字构件语义认知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研究指出，汉字区别于拼音文字，以直接表义为核心特征，汉字构形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概念化后的心智投射，依托具象构形承载抽象语义，这一特质为构件语义的隐喻、转喻

扩展提供了底层认知基础[9]。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古汉字及通用义符的隐转喻分析，侧重于历时溯源与整体体系的建构。其中，成字关注到现代汉字构件的语义组配研究，而在此基础之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现代人形构件的语义扩展规律，着重探析隐喻与转喻在其中的差异化运作机制。因此，围绕现代人形构件字在语义扩展过程中所体现的隐转喻认知规则及运作特征，相关探讨可有效填补既有研究在微观层面的细分不足。

2. “人”形构件体系与语义认知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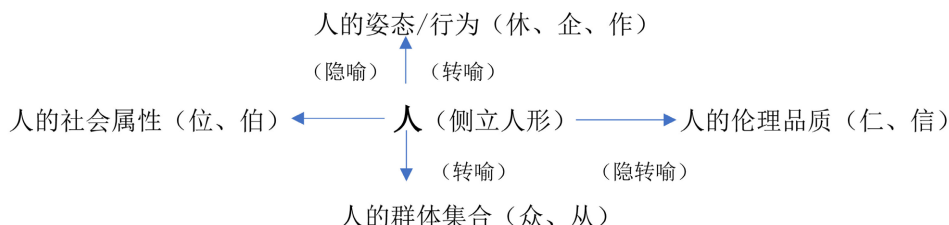
2.1. “人”形构件体系

所有变形人形构件依旧锚定“人”这一核心原型，形体简化并未割裂构件与人、人体行为、人伦关系的语义关联，为人形构件跨构件语义扩展提供了稳定的认知根基。根据《字表》对汉字中与“人”相关构件的界定，可以从实际应用角度，将常见的形体归类为八种与“人”相关构件。这些构件在字形上往往与人的形体或身体形态有关，具体包括大、人、亻、女、母、巳、儿、子、夭、尸、匕、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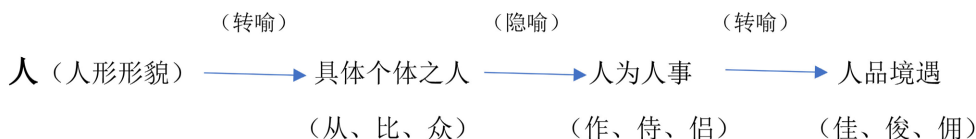
2.2. “人”形构件字语义结构

构件在参与构字的过程中，其自身的语义不断发生扩展与分化，逐渐形成“一形多义”的语义网络。这种网络并非杂乱无章，而是呈现出具有认知理据的内部结构模式。通过对人形构件及其关联构件语义扩展路径的系统考察，可将其内部语义结构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放射型结构、连锁型结构与综合型结构。

其一，放射型结构是指以构件的基本义为中心，多个引申义像光芒一样从中心向四周放射出去。基本义与各引申义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认知机制来看，放射型结构的各引申义通常由构件基本义经由不同的隐喻映射或不同的转喻指代直接派生而来，它们共享同一个认知原型，但各自走向不同的语义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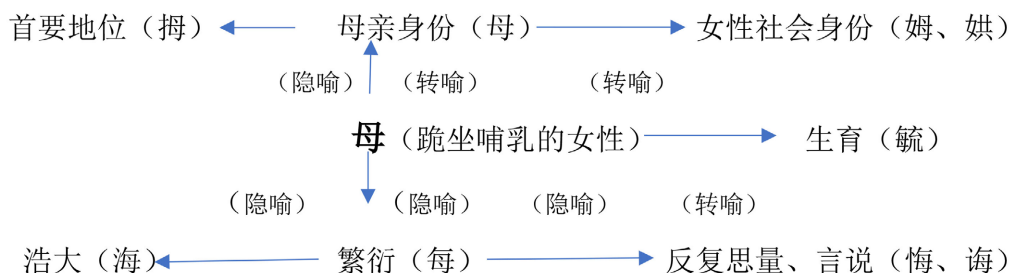


其二，连锁型结构是指构件的基本义在与其它构件进行语义组配时产生第一个引申义，继而在此引申义基础上产生第二个、第三个引申义，各引申义之间形成链式递推关系，并非均从基本义直接派生。从认知机制来看，连锁型结构的每一步引申通常对应一次转喻或隐喻操作，且前后步骤之间往往呈现“转喻→隐喻”或“隐喻→转喻”的交替推进。



其三，综合型结构是指构件语义扩展过程中，放射型与连锁型合并出现，二者交织共存。在多数高频人形构件的语义网络中，单一的放射或连锁结构往往不足以解释其全部的语义衍化路径：某些引申

义直接从基本义放射而出，另一些则依赖链式递推逐层派生，二者共同构成一个网络化的语义拓扑结构。



3. “人”形构件字语义组合中的转喻类型

转喻是人形构件语义扩展的基础原生机制，核心认知原理为同一概念域内的概念邻近性指代，无需跨域映射，仅依托实体、事件内部的整体与部分、主体与结果、状态与内核等关联关系，实现域内语义的替换、收缩与泛化。相较于隐喻，转喻更侧重具象语义的生成与延伸，是汉字本义、基础引申义形成的核心依托。结合人形构件构字特征，可将其划分为实体域、事件域两大转喻类型，各类型包含双向细分范式。

3.1. 实体转喻

实体转喻是人形构件最基础的转喻类型，聚焦人体及关联实体的物理范畴，依托同一实体辖域内整体与部分的概念邻近性，在构件组配表意过程中实现整体与部分的语义互换，可细化为整体转部分、部分转整体、部分转部分三类认知模式。

整体转部分，即以完整人体的构件本义为基点，借助实体内部的邻近关联，将语义收缩至人体局部部位或形态，实现整体向局部的聚焦。如“伐”字从“亻”从“戈”，其构意为用戈砍人头^[10]，“亻”本指完整的人，但在整字语义中借助人形与头部的邻近关系转指受伤的“人头”，使宽泛的人形语义得以具体聚焦。又如“天”字，甲骨文描摹正面站立的人形之上突出头部^[11]，本义为头顶、至高之处，同样依托躯干与头部的空间邻近关系，将完整人形收缩至人之头部。二字均依靠人体实体内部的空间邻近性完成整体向局部的转喻收缩，是具象动作类与空间指位类汉字共同遵循的表意策略。

部分转整体，则以人体局部姿态或肢体为语义起点，借助局部与整体的绑定关系，将语义放大至人的整体行为、状态或心境，这是会意字最常见的转喻范式。如“妾”字从“辛”(刑具)从“女”，字形描摹女子身负刑具的局部受制姿态，以刑具加身之态转喻有罪女子、女奴的完整身份定位。又如“奴”字从“又”(手)从“女”，描摹以手执女、施以控制的局部动作，以执持之态转喻奴婢受人驱使、供人役使的完整身份归属。二字均以女子形体的局部特征为转喻支点，“妾”取刑具加身之态，“奴”取手执控制之态，分别转喻其在等级秩序中的整体身份定位，实现了从局部形体到整体身份的语义升级。

部分转部分，则立足同一人体实体域，在局部肢体或形态之间进行语义互换，不涉及整体语义，仅依靠局部要素的并列邻近性实现迁移。以“付”“冠”二字为例。“付”从“亻”与“寸”，《说文》训为“与也，从寸持物对人”。“寸”本指手腕寸口，因同属手臂实体，借局部邻近关系转指全手，使“交付”的施动工具得以明确。“冠”由“冃”(帽)、“元”(首)及“寸”会意，本义为以手戴帽于顶^[11]，其中“寸”亦由寸口转指手部，动作施动者因此具象化。二字皆依托手臂内部局部的邻近关系，完成“寸口→手”的语义迁移，构成同一人体域内的局部转喻。

总体而言，这三种模式共同构建了人形构件从“人体物理域”向“动作、状态、心境”等抽象语义

扩展的认知桥梁,体现了汉字以具体喻抽象、以局部代整体的经济性与灵活性。

3.2. 事件转喻

事件转喻是人形构件动态语义扩展的核心类型。它突破静态实体范畴,聚焦于人类行为及人际互动所构成的动态事件域,依托同一行为事件内部整体过程与局部动作、行为主体、行为结果、行为缘由之间的概念邻近性,完成事件语义的双向替换与延伸。与实体转喻相似,事件转喻同样可划分为三类认知范式。

整体转部分,即由完整的人类行为事件转指其内部的核心动作或关键环节。该模式借助事件整体与局部之间的概念邻近性,收缩语义范畴,以简化复杂事件、聚焦核心行为。以“印”字为例,其构形为以手按抑一人下跪[12],构件“卩”本义为跪坐之人,承载“人下跪落座”的完整行为事件。整字表意中,以“人跪坐”之完整事件转喻提取“下跪”这一核心局部动作,从而精准凸显“按压臣服”的基本字义。“射”字现代字形从“身”从“寸”,其中“身”为人形构件,“寸”为手形讹变。其构字本义承载“人持弓搭箭、拉弦放矢”一整套完整的射击事件,包含持弓、搭箭、拉弦、发射等多重环节。文字依托事件整体与核心动作的邻近关联,舍弃持弓、搭箭、瞄准等次要环节,以整套射击事件转喻其中关键局部动作“放箭、发射”,从而锁定字形核心表意。二字均立足完整行为事件与其内部核心环节的邻近性,通过整体向局部的语义收缩,使复杂事件简化为可标注的核心动作,是事件域转喻在会意字构形中的典型运用。

部分转整体,以行为主体、行为结果或局部动作为语义切入点,经由局部与完整的绑定关联放大语义维度,进而指代完整的人类行为事件。此范式是字义泛化与语义丰富化的重要路径。以“囚”字为例,其外围“口”描摹封闭之牢狱空间,内部嵌有人形构件“人”。构件“人”作为行为主体,是“人被拘禁、被围困”这一完整事件的核心局部要素,依托“主体-完整事件”的概念邻近性,以空间内之人(事件部分)转喻“拘禁犯人”的完整事件,最终固化为“囚犯、拘禁”的整体字义。“伏”字从“人”从“犬”,字形描摹人如犬般趴卧于地、蜷身隐匿的局部姿态。该姿态是“潜伏伺机”这一完整行为事件的核心动作环节,依托“局部动作-完整事件”的概念邻近性,以趴卧蜷身之姿(事件部分)转喻“潜伏、伺机而动”的完整行为事件,进而引申为“降服、屈服”的抽象语义。二字均以事件的局部要素,“囚”以主体代人,“伏”以动作代事件,实现部分向整体的转喻放大,是事件域转喻在会意字构形中的典型运用。

部分转部分,立足同一人类行为事件域,实现事件内部不同要素的语义互换,涵盖行为动作与行为缘由、行为主体与行为结果、动作过程与行为目的等局部要素间的跨维度转喻。此范式是抽象行为字义生成的重要机制。以“安”字为例,以“宀”表居室,以“女”为核心人形构件,描摹“屋内有女安居”的静态场景事件。在该事件域内部,“女子安居之状态”属场景表象,“人心安稳、环境安宁”则属由此引发的心理与客观结果,二者同属“安居”事件域的不同局部要素,依概念邻近性完成行为状态向事件结果的转喻延伸。“保”字从“人”从“子”,字形描摹大人以手臂环抱幼子之形,同属“护养孩童”单一事件域。“大人环抱幼子”是可视的动作过程这一局部要素,“抚育、守护、庇佑”则是该动作所对应的行为目的与价值结果,二者为同一事件内部两类不同局部要素,依托概念邻近性完成动作过程向行为目的的跨部分转喻,生成抽象的守护义。二字均以事件内部不同局部要素间的语义互换实现字义引申,是事件域转喻中跨维度迁移的典型体现。

综合上述分析,现代汉字人形构件的转喻语义扩展具备鲜明的规律性特征。其一,认知域高度封闭,所有转喻均立足人体实体、人类行为事件两大核心域,无跨域映射行为,完全依托概念邻近性完成域内语义变动;其二,语义层级由具象向浅表抽象递进,实体转喻多对应字形本义,事件转喻多对应字义引

申义，是汉字基础语义生成的核心依托；其三，适配构件组配规律，简单会意字、包围结构汉字多采用单一实体转喻或事件转喻，语义直白浅显，是低年级识字的核心认知逻辑。

4. “人”形构件字语义组合中的隐喻类型

目前学术界对概念隐喻的认知机制虽已达成共识，但针对隐喻的分类还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学者根据规约性将概念隐喻分为规约隐喻和新颖隐喻。有的学者则提出活隐喻、死隐喻及休眠隐喻的划分办法。还有的学者把隐喻分为刻意隐喻和非刻意隐喻。以上的分类都是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而给隐喻赋予了不同的名称、标签。本文采用 Lakoff 和 Johnson (1980)提出的隐喻分类：结构隐喻、实体隐喻、方位隐喻。

4.1. 结构隐喻

结构隐喻是应用最广泛的隐喻类型，其核心逻辑为提取人体形态、人类行为的具象结构特征，系统性映射至陌生、抽象的目标域，以熟悉的人体结构赋能抽象概念表意，实现“具象结构→抽象规律”的跨域转化。如“从”字以双“人”前后相随的排布结构，提取“前后追随、次序递进”的行为特征，跨域投射至社会行为域，隐喻顺从、效仿、依从的通用事理逻辑；“比”字以双“人”并列对照的形体结构，提取“并排参照、相互对标”的结构特征，跨域投射至社会关系域，隐喻对比、攀比、等同的社会关系。结构隐喻始终以人体经验为认知起点，将可感知的身体图式转化为理解世界的认知框架，充分体现了“近取诸身”的认知传统在汉字构形中的深层运作。

4.2. 实体隐喻

实体隐喻的核心功能是消解抽象概念的模糊性，将无形、难感知的社会制度、法理规则、身份地位、心理状态等抽象概念，依托人形及人相关的实体载体加以具象化，实现抽象语义的固化与落地，是汉字人文语义、社会语义生成的核心路径。如“报”字，其构意为以手制服罪人使之服法[13]，其构件“𠂔”（“才”的讹变来源）本义为手铐这一具体惩戒器物，依托“器物约束人身、惩戒过错”的实体功能特征，跨域映射无形的法律法理，将抽象的“规则约束、罪责惩戒”法理内涵，具象化为手铐的实体约束功能。身份地位层面，“位”字以“亻”代表人站立的实体空间点位，将无形的社会阶层、身份席位、权责地位，隐喻为可感知的空间位置，把抽象的人际等级关系转化为具象的空间图式。二字分别以器物实体和空间实体为认知中介，将抽象制度与抽象身份落实为可感知、可推衍的实体经验，体现了实体隐喻将无形经验转化为有形认知的核心价值。

4.3. 方位隐喻

方位隐喻是汉字独有的特色认知机制，依托构件排布的上下、前后、主次等空间方位关系，将直观的空间秩序系统性投射至时间次序、人际尊卑、社会统属、价值高低等抽象领域，以空间认知赋能抽象秩序表意。“先”字构件呈“上足下人”的空间布局，足部居上、人身居下，凭借“上为前、下为后”的空间认知图式，将人体迈步时的空间位置关系隐喻为时间上的先后次序，从而引申出“率先、先行”的时间语义。“令”字古文字构型为上部“亼”（倒口，象发令者之口或人形）居上、下部“卩”（跪坐之人）居下的双人形排布[14]，以构件上下空间的层级差异，隐喻人际尊卑与上下级统属的权责关系，上者发号施令，下者跪坐听命，将抽象的社会等级秩序固化为直观的字形空间结构。二字分别以“前后”与“上下”的空间图式，将时间次序与社会等级两类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空间关系，充分体现了方位隐喻以空间认知构建抽象秩序的核心功能。

三种隐喻类型分别对应“身喻”的三个认知向度：结构隐喻以人体结构映射自然与社会事理，实体隐喻以器物与空间具象化抽象制度与身份，方位隐喻以空间图式固化时间与社会秩序。三者共同遵循从

“身”到“物”、从“物”到“事”、从“事”到“理”的递进逻辑，将身体经验锚定为意义投射的最终原点，系统体现了汉民族“观身取象”的认知传统。

5. 隐喻与转喻的互动认知

构件的语义变化呈现为一个多步骤的认知过程——转喻与隐喻交替作用、逐层推进，共同驱动字义从具体向抽象、从单一向多维的持续扩展。基于对前文典型字例认知路径的还原分析，可将转喻与隐喻在人形构件语义扩展中的互动关系归纳为两种主要方式：转喻链与隐转喻互动。

5.1. 转喻链

转喻链是指构件语义在同一认知域内经由多次转喻操作、逐环传递而形成的链式推衍序列。序列中的每一环节均为转喻操作，不涉及跨域隐喻；相邻环节之间凭借概念邻近性建立连接，前一个转喻的输出项成为后一个转喻的输入项，语义信息在传递中持续聚焦或偏移，最终抵达一个与起点在认知上相距甚远、但每一步均有邻近性理据可循的语义终点。以人形构件字“企”为例可直观印证转喻链的认知特征。“企”由人形构件“人”与足部人形构件“止”构成，语义推演全程封闭于人体行为认知域，仅通过多轮转喻逐环推进，无任何隐喻跨域操作。其本义为人踮足站立的人形姿态，首先由整体身形转喻踮踵站立的肢体动作，再由踮足眺望的肢体行为转喻远望探寻的行为目的，最终依托行为与心理的邻近性，转喻出期盼、企求的心理状态。整条语义链条层层递进，前一环节语义为后一环节推演基础，语义逐层偏移延伸，虽最终引申义与原始人形本义差距较远，但每一步推演均具备认知邻近理据，是典型的人形构件语义转喻链。

5.2. 隐转喻互动

隐转喻互动是隐喻与转喻交替嵌套、协同发力的复合认知模式，也是人形构件高阶抽象语义生成的核心机制。相较于单一域内运作的转喻链，隐转喻互动必然包含跨域映射环节，隐喻承担语义升维功能，将语义从人体具象域投射至社会、道德、制度、心理等抽象域；而隐喻的源域素材、具象基础往往由前置转喻先生成，并非直接从构件本义直接跨域跃迁。当语义迁移需要完成“人体具象范畴向抽象事理范畴”的远距离跨越时，单一认知机制无法完成语义衔接，必须依托转喻铺垫、隐喻升维的协同模式。结合人形构件构字规律，可将隐转喻互动细化为“转喻前置铺垫、隐喻跨域升维”“隐喻先行架构、转喻落地细化”两种核心子模式。

第一种为转喻铺垫、隐喻升维，也是人形构件语义抽象最主流的互动路径。该模式先通过多轮转喻在具象认知域内完成语义细化、语义聚焦与语义定型，生成稳定的中间引申义，为后续跨域隐喻提供成熟的具象源域，再依托隐喻相似性原理完成抽象语义升级。整体呈现“先域内深耕、后域外升维”的递进特征，绝大多数人形构件抽象字义均遵循该路径。构件“𠂔”的高阶语义演化同样遵循该模式。“𠂔”本义跪坐人形，先通过事件转喻由跪坐体态聚焦臣服、听命的从属行为，完成具象行为的语义定型；再依托方位隐喻与结构隐喻，将“上下尊卑、听从服从”的肢体行为结构，跨域映射至社会制度与等级秩序域，最终衍生出权责、号令、天命秩序等抽象社会语义，对应“令、命”等字的高阶表意，实现从人体姿态到社会制度的完整认知跃迁。

第二种为隐喻先行架构、转喻落地细化的辅助互动路径。该模式先依托方位隐喻、结构隐喻搭建抽象的秩序框架、事理框架与关系模型，确立跨域语义的整体认知方向，再通过转喻机制细化事件要素、补充行为细节、固化语义内涵，让空洞的抽象隐喻框架落地为具体、可感、稳定的字义。该模式多用于表达社会秩序、等级规范、空间事理的人形构件汉字。以“位”字为例，构件“亻”为人形实体，首先

依托实体隐喻搭建核心认知框架，将人站立的具象空间点位，跨域隐喻为社会身份、阶层、权责的抽象位置秩序，初步完成具象到抽象的框架搭建；再依托实体转喻细化语义边界，由人形站位的空间实体，转喻为人的专属身份、专属席位与对应权责，填充抽象框架的具体内涵，最终固化为地位、职位、名分的完整字义。先由隐喻确立抽象事理模型，再由转喻细化语义细节，二者互补完成复合构意。

总体而言，转喻链保障了汉字具象语义、中层引申义的理据性与层级性，实现语义在身体、行为域内的有序延伸；隐转喻互动则突破具象认知边界，通过两种机制的嵌套联动，完成汉字抽象人文义、社会义、制度义的生成与固化。两类互动模式共同构成人形构件语义扩展的完整认知链条，完美解释了汉字“由形及义、由近及远、由身及道”的民族认知规律。

6. 研究结论与教学应用价值

6.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系统探究现代规范汉字人形构件的语义扩展认知机制，得出核心结论如下：第一，现代简化汉字的人形构件虽形体符号化，但始终保留“人体认知”的核心原型，形简理存，语义认知体系完整稳定；第二，人形构件依托人类、人体、行为三大语义范畴，形成放射型、连锁型、综合型三大语义结构，语义衍生具备极强的认知规律性；第三，转喻与隐喻是语义扩展的两大核心动力，转喻依托邻近性实现域内具象语义延伸，隐喻依托相似性实现跨域抽象语义映射；第四，隐转喻呈现多元互动规律，以“转喻铺垫、隐喻升级”的链式联动为核心模式，推动汉字语义从具象到抽象、从单一到多维逐层演化。同时，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仅聚焦共时层面的现代规范汉字，未涉及古今汉字语义认知的历时演变对比，后续可结合古文字形体演变，完善人形构件语义认知的历时演化脉络。

6.2. 教学应用价值

本研究成果可直接破解当前汉字教学“死记硬背、形义割裂、无据可依”的痛点，为中小学识字教学、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提供理据化、体系化的教学思路。其一，构建原型化识字体系。依托“人体原型”核心认知，建立“人形构件－具象形体－动态行为－抽象事理”的阶梯式识字逻辑，让学生依托统一认知规律批量掌握同类汉字，替代碎片化机械记忆，提升识字效率。其二，区分层级化教学重点。低年级侧重讲解转喻机制对应的具象字义，依托形体邻近性理解汉字本义；中高年级侧重讲解隐喻机制对应的抽象引申义，依托跨域相似性理解汉字深层语义，适配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水平。其三，赋能对外汉语教学。针对海外学习者汉字认知短板，通过“身体取象”的通用认知逻辑，消解汉字表意的神秘感，以具象认知规律解释抽象字义，降低汉字学习难度，助力汉字国际化传播。其四，传承民族认知思维。通过构件语义认知教学，让学习者理解汉民族“近取诸身、以己度物”的核心思维模式，挖掘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 [1] 王宁. 汉字构形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20.
- [2] 王力. 同源字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5-36.
- [3] 许进. 汉字的比喻造字法[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0(1): 57-61.
- [4] 李秀明. 《说文解字》“心部”字的隐喻研究[J]. 三明学院学报, 2006(1): 45-48.
- [5] 滕华英. 汉语同源词形成发展认知机制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 [6] 钟力明. 隐喻性思维在汉字造字中的显现[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20): 101-103.
- [7] 陈枫. 汉字字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03-114.

-
- [8] 周运会. 论汉语符号的隐喻起源[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1): 27+140.
- [9] 成宇. 基于事件域认知模型理论的现代汉字构件语义组配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4.
- [10] 李学勤. 字源[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718.
- [11] 董莲池. 说文解字考正[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1.
- [12] 曹先擢, 苏培成. 汉字形义分析字典[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83.
- [13] 黄德宽. 古文字谱系疏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3422.
- [14] 钱中立. 汉字源流大典[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20: 293.